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20年4月17日

第10期

06 历史钩沉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与发展

07 业务探讨

民国古籍新式印刷简述

以重庆图书馆馆藏为例

08 镇馆之宝

天津图书馆古籍珍品：

辗转留存，光耀后世

09 镇馆之宝

沈阳市图书馆吴廷燮写本《明实录》：

罕见珍本，极具价值

10 业务探讨

古籍与特藏文献的装具及保护方法

11 图书推荐

中华书局《十六国春秋辑补》整理出版

12 图书推荐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

出版缘起

《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篇》

出版缘起

中国书店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与发展

□ 刘易臣(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

中国古籍修复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技艺日臻成熟,人才不断涌现。北京琉璃厂成为古籍修复技艺传承的重要阵地。成立于1952年的中国书店,即立足于北京琉璃厂,随着公私合营的发展,这里汇集了民国以来北京诸多私营旧书店里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他们成为中国书店第一代古籍修复师。中国书店第一代古籍修复师在完成大量修复工作的同时,还十分注重技艺的传承,为公共图书馆等单位培养了众多人才,使古籍修复技艺从琉璃厂走向全国。

中国书店现已有四代修复师在这里辛勤耕耘,先后为社会各界修补残破的古籍几十万册,其中不乏善本、孤本等珍贵古籍,古籍修复工作得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并于2008年6月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装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技艺)”。此后,中国书店还将在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修复中心建设、承接修复与馆际交流、古籍修复技艺的宣传与展示方面不断深耕。

古籍修复技艺源远流长

我国古籍修复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伴随着书籍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三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古籍修复技艺也随着古籍载体、装帧形制的变迁而不断发展,经历了从简单到成熟的过程。

商代至汉末,文字多书写在竹简上,用绳按顺序编成卷,此时的古籍修复工作主要是将断绳的竹简重新编排好。魏晋至唐中期,随着造纸术的日臻成熟,古籍修复技术也根据对象的变化而大幅革新并日求精致。五代至明清时期,印本书籍得到普及,装帧形制也从卷轴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逐步演变成明中期以来流行的方册线装。至明万历时期,古籍修复技艺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出现专门讲述书画、古籍、碑帖修复装裱的著作——周嘉胄的《装潢志》。此时,古籍修复技艺也逐步同书画修复技艺、碑帖装裱技艺分流,成为一项专业技术。

清康熙盛世以来,由于科举制度和《四库全书》的编纂,大批文人学士往来京师,作为当时书业中心的琉璃厂成为他们看书、售书和购书的最佳去处,翁方纲曾在《复初斋诗集》中记载:“乾隆癸巳开四库馆,即于翰林院藏书之所分三处:凡内府秘书发出到院一处;院中旧藏《永乐大典》,内有摘抄成卷、汇编成部者为一处;各省采进民间藏书为一处。每日清晨,诸臣入院,设大厨,供茶饭,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是时浙江书贾奔辇下,书坊以五柳居、文萃堂为最。”

书业的兴盛为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必要基础。琉璃厂书肆中经营的古籍往往收购自民间,那些古籍大多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有的甚至书页破碎、焦脆、糟朽,难以翻阅。为了提升古籍的经济价值,书肆往往安排心灵手巧的伙计对那些古籍进行修复,这在客观上起到了传承修复技艺、保护古籍的重要作用。不仅书肆会主动修复古籍,以提升其价值,就连读书人、藏书家也会请书肆的修复师来修复、装潢自己的藏书。清代同治、光绪时期,内务府更曾将一部分清宫珍藏的“天禄琳琅”藏书交付琉璃厂的书肆进行修复、装潢。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古籍修复技艺在琉璃厂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琉璃厂也成为传承这门技艺的重要阵地。

至清末民初时期,北京琉璃厂、隆福寺、报国寺等地聚集了上百家书肆。其中,以古籍修复装潢而负盛名的当属肆雅堂书肆。肆雅堂,开设于清光绪年间。店

主是河北束鹿县人丁梦松,书店除了收售古旧书籍之外,还以装裱修复碑帖书籍、装潢书画负有盛名。清末缪荃孙著《琉璃厂书肆后记》一文中载:“肆雅堂,肆主丁子固,得崇雨舛之书。先为湖南方柳桥收购旧籍,柳桥歿,又捆载其书来京售之,善装潢”。新中国成立后,很多闻名遐迩的古籍修复师都是出自琉璃厂肆雅堂。1956年,肆雅堂归属中国书店。

大力培养古籍修复人才

1952年,在郭沫若、郑振铎、吴晗、齐燕铭、邓拓、张友渔等人的倡议下,国营旧书店“中国书店”成立,并于1956年与北京111家私营古旧书店合营,为北京的古旧书业翻开了新篇章。中国书店成立不久,就组建了装订修补部,由王志鹏、刘乃仪任负责人,附设于读者服务部并受其领导。后随着公私合营,中国书店汇集了民国以来北京诸多私营古旧书店里擅长古籍装订、修补技艺的老师傅,改装订修补部为装订修补厂,这就是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的前身。韩斯久、王志鹏、乔景熹、姜昭栋、李佩亭、韩俊如、张恒吉、李恒连、汪增仁、魏忠虞、赵树枫等老师傅,成为中国书店第一代古籍修复师。

韩斯久于民国时期在隆福寺的修德堂书肆从事古籍收售和修复业务,曾到当时著名藏书家陶湘的家中帮助修复古籍,并被陶湘奉为上宾。韩斯久进入中国书店之后,因精于古籍修复技艺而专门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古籍到他那里简直就是手到“病”除。曾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组组长的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对他有这样一番描述:“中国的旧书,有时买到手的时候,是很破烂的,必须要修补,重新装过。隆福寺修德堂有一个很会修书的老工人韩斯久,如明刊本的半部《三国志演义》,就是他经手修的,要一张一张地补虫眼,加衬纸,工作很麻烦,但很精细。我并且找了明瓷青纸做封面,装好以后,漂亮极了。四川杜甫草堂有几本好书,也是这个老工人动手修的”。

王志鹏于民国时期在琉璃厂的邃雅斋从事古籍收售业务。他精通古籍版本鉴定,习得精湛的古籍修复技术,在琉璃厂书肆中堪称翘楚。后来,他成为中国书店装订修补部的首任负责人,为发展国有体制下的古籍修复业务做出了贡献。此外,他非常重视古籍修复技艺与传统雕版印刷技术的传承工作,并在传承技艺的过程中精心准备教学材料,深入浅出地为中国书店举办的古籍修复技艺培训班和全国古书

业务培训班的学员们讲授“古书装订修补常识”。中国书店于1964年编写的《古书装订修补常识简介》便是由他主笔,该书曾作为参考读物分发给全国古旧书店从业人员。可以说,王志鹏为古籍修复技艺的传承付出了毕生心血。

1957年,周叔弢与徐森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联合提案,建议设立古籍修复技术班,培养修复专业人才。为落实全国人大代表关于加强培养线装古籍文献修复工作的提案,中国书店受文化部委托,先后于1961年和1964年,为各地省、市图书馆举办两期古书装订、修补业务技术培训班,每期历时两年,采取请专家授课、师傅带徒弟及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方法,培养了刘锦宏、白放良、陈莲贞、李杰等十多位古书装订、修补技术人员。古籍修复技艺开始从琉璃厂走向全国。

1956~1966年的十年间,中国书店第一代古籍修复师在完成大量修复工作的同时,还先后培养和造就了中国书店的第二代古籍修复师,如张励行、张桂花、张宝英、张英、张兰英、张粹英、韩秀芬、佟树贞、冯秀云、吕奎双、雒春芬、朱洁清、王安焱等。

六十余年来,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几经变化、不断发展,现已有四代修复师在这里辛勤耕耘,先后为社会各界修补残破的古籍几十万册,其中包含有相当数量的善本、孤本等珍贵古籍。众多专家学者看了中国书店修复的古籍后,给予了中国书店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北京市原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为中国书店古籍修复工作题词:“救活破旧书,使古为今用”;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楨题词:“装潢旧籍有传人,粉白驳红气象新。变化神奇于腐朽,从残整理更为今”;北师大著名教授刘盼遂题词:“参阅之后,欢喜无量,真古籍之‘续命汤’也”。张政烺、赵万里、魏建功、王伯祥、罗继祖等专家学者也都纷纷题词赞许。

古籍修复的传承与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书店加强了古籍修复技艺传承、修复中心建设、承接修复与馆际交流、古籍修复技艺的宣传与展示方面的工作。

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古籍修复技艺作为一项特点鲜明的传统技艺,具有其独特的传承特点,需要古籍修复者具备以下素质:一是熟悉各朝代书籍的形制和版本,有版本鉴别的能力;二是了解各朝各代的纸张、印工、装帧风格等特征;三是做到技术熟练,操作细致,诚如明代周嘉胄《装潢志》中所讲,古籍修复“须具补天

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任者,乃不负托。又须年力甫壮,过此则神用不给矣”。

中国书店深知古籍修复技艺必须依靠“师带徒”的方式才能得到有效传承。古籍修复技艺实践性很强,需要经过长期积累才能熟练掌握,其中的很多修复手法难以用语言文字、示意图表达,如果不是师傅们反复演练、反复讲解,甚至手把手教导,学徒们很可能无法完全领会。因此,中国书店利用企业优势,在选拔修复传人时先培养他们的古籍鉴定能力,经测试合格者再安排其学习如何判断各朝的纸张、印工和装帧风格,最后才能学习古籍修复技艺。整个学习过程长达数年,学徒们与师傅们一起工作、一起切磋、一起合作,共同进步,以此培养出一代代修复师。

修复中心建设:中国书店积极融合吸收古籍修复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引进纸张检测设备,成立古籍纸张及修复用纸检测工作室,谋求古籍修复技艺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得到更好地发展,为古籍提供更科学、更有针对性、更持久的修复与保护。对于修复古籍所用的纸张和补纸,往往是通过修复师的视觉、触觉、感觉来判断的。中国书店引进古籍纸张检测设备之后,修复师可通过纸张化学性质、物理性质的各项指标检测结果来加深对纸张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也可将量化的数据与微观的检视结果作为修复工作的基础。这有利于中国书店整体古籍鉴定、修复领域相关工作的展开,进而对传统古籍鉴定、古籍修复事业形成科技助力,推动这两方面工作的发展。

承接修复与馆际交流:中国书店组织了多批次修复工作组,承担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以及文物保护单位古籍修复工作。2000年以后,先后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图书馆、北京智化寺管理处、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方志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印刷博物馆等修复古籍,并与各单位就古籍修复技艺积极交流。

古籍修复技艺的宣传与展示:中国书店作为古籍修复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保护单位,以开展专题讲座和互动体验的方式,向社会宣传、介绍、展示古籍修复技艺。自2015年至今,每年参与“非遗进校园”“非遗进社区”活动十余次,在书店或大学举办古籍修复方面的讲座三至四次,2019年更是走进北大教育集团北医附中,以古籍修复作为选修课,为初中学生讲述古籍修复技艺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让更多的青少年能够了解古籍修复工作及其意义。

民国古籍新式印刷简述

以重庆图书馆馆藏为例

□袁佳红(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周兴伟(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馆员)

重庆图书馆作为西南地区的大型省级图书馆,其前身为1947年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而修建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建馆之初,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委会制定了征购图书的政策,其中一条即为“旧书不讲版本而求基本国学书之全备”。从1947年到1955年间,通过调拨、捐赠、抢救、购买等多种途径,重庆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古籍文献、碑帖字画、稿抄本、大藏经等已达45万册件。

2017年,重庆图书馆完成了1912年前古籍的普查工作,共计23326部292381册。同年,重庆图书馆开始了民国古籍的整理编目工作。民国古籍由于受出版时间短、战乱频繁和新兴出版方式的冲击等因素影响,出版数量相对比较少。重庆图书馆藏有各种民国古籍1万多部10万余册。

民国古籍中的新式印刷技术

民国古籍,除一部分是沿袭传统的雕版印刷品外,更多的是由于西方新式印刷技术的广泛采用,在刊印方式、装帧形式、结构及内容等方面与传统古籍存在诸多差异,这部分文献是民国古籍的一大亮点。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古籍中,大量的金石、碑帖、字画、善本书影、印谱等,都是采用石印、铜版、锌版、珂罗版等新式印刷技术印制而成,其中不乏名家收藏,如刘伯承元帅捐赠给重庆图书馆的藏书中,就有一批民国时期西泠印社出版的印谱,具有较高的收藏研究价值。

1931年4月出版的《歌女红牡丹特刊》,登载了大东书局印刷所的广告,上面所列制版、印刷项目非常齐全,与照相印制相关的有:石印、珂罗版、胶版、铜版、锌版、木刻等。需要注意的是,广告中的“木刻”,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木版水印,也是舶来之物。贺圣鼐在《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引自张静声《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贺圣鼐系商务印书馆印刷总厂彩印股职员)中说:“光绪三十年,商务印书馆聘日人柴田来华雕刻黄杨版。其法:用一种药水将原图移于木上,一若照相,按影雕刻,其精美不让铜版,而精神过之。又有直用照相法者,其出品如出之名手,则非照相铜版所能比拟。于单色之外,更可为彩色,然以其价值昂贵,用途未能充分发展。”可见所谓黄杨版,其性质与无网目的铜锌版略同,区别是木版需手工雕刻,铜锌版用化学药水腐蚀,故后者成本较低;与木版水印的区别:一是引入了照相技术,二是油墨印刷。

石印是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先进印刷术,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所印书刊均为没有浓淡层次的黑白图像,包括《四部丛刊》在内的众多影印古籍,都是如此。不少普及型的书法、碑帖和习字帖,也采用石印印制,以降低成本扩大销路。商务印书馆、有正书局、中华书局等大型出版

商都曾致力于此。书法碑帖作品印成没有层次的黑白图,其韵味自然大打折扣,但多数非专业读者是感觉不到的,照样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相关知识。当然,保存了书法、碑帖,乃至绘画作品原貌的印制品,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在前述各类印刷方式中,印刷质量最好的是珂罗版和铜版,因为它们能够反映图像的浓淡层次,最大限度保留原件的面貌。珂罗版和铜版印刷,传入中国的时间大致相同,都在19世纪末。

铜版印刷的优缺点

铜版印刷依靠网目表现图像的浓淡层次,因此民国时期铜版又称“网目版”,有时网目版干脆就成了铜版的代名词。例如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有正书局《名画外集》,宣传《中国名画集》时说:“本集系搜罗唐宋以来诸大家名画真迹,制成珂罗版、铜版,分别精印成册”。在《临宋元十二景》画册版权页宣传《中国名画集》时则说:“本集系搜罗唐宋以来诸大家名画真迹,制成珂罗版、网目版,分别精印成册”,“网目版”代替了“铜版”。据藏书家韦力先生介绍:“有正书局还用这种木刻、玻璃版及人工着色相结合的办法,印了一些古名画”。韦力先生说的这一点,从重庆图书馆收藏的《中国名画集》中明确地反映了出来。

神州国光社的金石书画图册,也同时采用珂罗版和铜版印制。宣统元年(1909)刊印的《黄石斋书王忠文祠记》,系铜版印刷,册中介绍其制版印刷特色时,重点就放在了铜版的网目上:“本集所制网目铜版,其网目极密而细,极明而显,清朗悦目,可与玻璃版(珂罗版)相并,亦与寻常者迥殊”。当时实力较强的印刷厂(所)均设有铜版部(或称“金属版部”,含锌版)。相比于珂罗版,铜版印刷的优势是印制效率高、周期短,排版方便灵活,这些在以铅排字为主,出版周期严格的报刊中,尤为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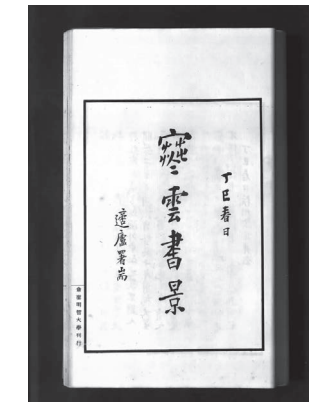
铜版印刷的缺点是设备投资

和日常花费甚高,非一般小厂能够承担。再有就是对印刷用纸的要求较严,要使用“蜡光纸”(铜版纸),更拉高了书刊成本。因此发行量较小的小众出版物,一般不会采用铜版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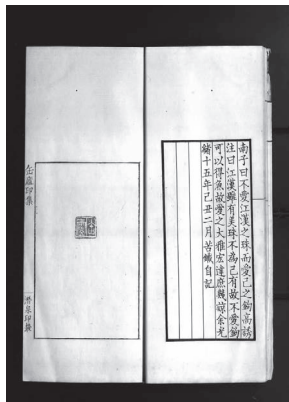
与铜版同属于金属版印刷的还有锌版,用途也十分广泛。铜版一般用在精细的网目版印刷,无需网目的黑白印刷则用价格低廉的锌版代替,印制效果与石印相仿,成本甚至更低。民国时期中华书局金属版部制作了不少黑白碑帖、书法字帖,便是用锌版印制的,如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十七年(1928)中华书局金属版部印刷的《历代碑帖大观》即是锌版印刷。艺苑真赏社在其宣传广告中有一类“金属版精印”的习字范本,也是锌版印制。当时的锌版习惯称之为金属版;铜版虽亦为金属版,因其价值远高于锌版,故从不用“金属版”之统称。锌版与铜版均采用化学腐蚀的方式制版,但锌版材质的强度和韧度较差,不适合制网目版。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六年(1922)上海艺苑真赏社缩影印本《碑联集》,虽然在版权页有“玻璃金属版宣纸精印”的说明,但却是锌版印刷无疑。

珂罗版印刷的优缺点

珂罗版印刷是将含有重铬酸盐的明胶溶液涂布在磨砂玻璃版上,形成一层感光膜,感光膜上覆盖图像摄影后的胶片,经晒版,胶膜会因图形各处深浅的不同,产生不同程度的感光硬度,不同的硬度具有不同程度的吸墨性,因此形成层次丰富的图像。与依靠网点形成层次的图像相比,珂罗版图像更加细腻、自然,更接近原件。珂罗版对印刷介质的宽容度较大,各种纸张、丝绸、绢帛均可。在复制书籍、碑帖、书法绘画作品时,可以采用与原件相同的纸张材料,具有更高的仿真度。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民国古籍,很多都是珂罗版印刷的,如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有正书局珂罗版印本《宋拓石鼓文》、民国十八年(1929)邵阳李氏宝墨斋收藏上海中华书局玻璃版印刷《六朝隋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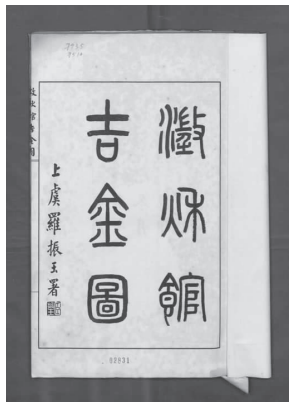
民国时期上海广仓学窘刊行的《寒云书景》



刘伯承捐赠民国初年吴昌硕编《缶庐印存》



1911年罗振玉编《殷虚书契前编》



1921年陈汝庵编辑《征秋馆吉金图》

写经真迹六种》。这一时期有正书局出版的系列碑帖,不仅在封面上显著标明“珂罗版精印”,在内页也有“珂罗版印有正书局各种碑帖”的简介。

珂罗版的另一个优点是印制题材广泛,尤其适合中国书法、绘画、碑帖,以及所有的古代刻本、抄稿本。这也是珂罗版传入中国后,大行其道的重要原因。

珂罗版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设备简单,从业门槛低,在没有电力的地方照样可以生产,非常适宜开办家庭式小作坊。这正是珂罗版印刷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原因之一。20世纪40年代,上海及各地珂罗版业大衰退,纷纷下马,而郑振铎先生靠一己之力,几种图册,“养活”了两个家庭式珂罗版厂家,便是一例。1947年,郑振铎在上海编辑出版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西域画集》《唐五代画》《汉晋六朝画》等一系列画册,都是依靠戴圣葆的申记印刷所和胡颂高的安定印刷所印制的。而两家珂罗版印刷所,均属家庭小作坊,几年的时间,仅凭上述画册赖以生存。

珂罗版的不足之处:首先是“靠天吃饭”,早期珂罗版晒版是将玻璃版置于室外阳光下照射,如遇阴天就要停工。难怪郑振铎当年在上海出版画册时,经常因为天气原因耽搁出书时间。其次,珂罗版的耐印度非常低,一块印版最多印200张,再印便须重新制版。再次,珂罗版由于是手工操作,效率极低,民国时期,一名熟练工人一天也就印200张左右。按8小时工作制计算,一人一天最多印100来张。最后,珂罗版的质量不稳定。珂

罗版每印一张,便须清洁版面重新打墨,都是手工活,同一块版,不同的师父,打墨的手法不同,印出的活就不一样;有时甚至同一个人印的活墨色也有差别。

珂罗版印刷设备和耗材的费用虽然不高,但人工成本巨大,加上生产效率低、周期长,因此只适合高质量、低印数、对出书时间要求不严的短版活。从珂罗版传入中国后的发展看,也正是沿着这一途径前行的。

中国最早涉足珂罗版印刷,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出版商,有神州国光社、有正书局、商务印书馆、艺苑真赏社、文明书局、中华书局、西泠印社等。印制的题材基本相同,碑帖、绘画作品居多,其中的重点是绘画。照相制版技术出现前,中国古代绘画中笔画繁复、具有浓淡层次的作品,都不能复制流传。对此,神州国光社在其画册“谨告购书诸君”一文中说:“古来唯墨迹始能寿之贞石,画则不能。盖画笔有干湿浓淡,不可入石也。及至今日,始发明玻璃版法以印画。其工妙能使面目精神丝毫不失,尤非刻石摹拟者可比”。其说虽有一定道理,却并不全面,因为非但“画笔有干湿浓淡”,墨迹同样有干湿浓淡,亦不可入石。广告语所说之“墨迹”,实为书法墨迹的轮廓而已。

总之,民国时期由于中西文化的交流日益扩大,反映在出版业方面,既有装帧形式的中西混杂,也有印刷方式的中西结合。在此,我们一并附上小部分重庆图书馆收藏的新式印刷珍贵民国古籍图录,以飨读者。

天津图书馆古籍珍品 辗转留存 光耀后世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二十六卷四十四回

(清)吕抚撰,清雍正乾隆间正气堂活字泥版印本,二十四册

吕抚,字安世,号逸亭。浙江新昌人,生于康熙十年(1671)。屡试不第。因感史书词义深奥,不易读懂,所以萌生“将古今事迹,汇为通俗演义”的想法。《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是一部以二十一史为题材而撰写的通俗长篇小说。作者吕抚在书中以插叙手法记述了自己创制活字泥版的具体方法,并且把他创制工具和使用方法用绘图的方式进行详细解说。

泥活字印刷术是宋代毕昇发明的。这一历史事实详细记载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但是泥活字印本书籍一直未见实物流传。直至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江苏吴县李瑶仿照毕昇的制造方法,采用泥活字印刷了自己的著作《金石例四种》和《南疆绎史》等书,泥活字印本才出现在世人眼中。而吕抚这部书比李瑶的印

书时间提早了约一百年。

泥活字只是这部书生产过程中的一个步骤,而最终形成的是通过活字制成的泥版。泥版印书,在我国古籍中不见记载。1804年英国人斯坦荷普伯爵发明泥版,是现代纸型印书法的雏形,其原理与吕抚制作方法相通,而吕抚的制造时间比斯坦荷普伯爵提早近70年。吕抚创造的活字泥版印书方法,是中国传统印刷术中活字与雕版两项印刷技术的有效结合,是我国古代印刷术中的又一新工艺。

这部书的主要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它的历史资料性方面,通过对活字泥版制作方法的详细介绍,为我国古代印刷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另一方面,书籍本身是活字泥版印刷方法的实践产物,传本稀少,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已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穆天子传》六卷

(晋)郭璞注,(明)程荣校,明万历程荣刻汉魏丛书本,一册,清黄丕烈校并跋

西晋初年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出土了大量的竹简古书,后人称作“汲冢古文”或“汲冢书”,《穆天子传》是这些出土古书中唯一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内容为记载周穆王西征东巡之事,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晋代著作郎、尚书郎郭璞作注。早期以钞本流传,到宋、元时方有刊刻,但宋元刻本未能保存下来,至明正统年间被编入《道藏》始见流传,明清时传本甚多。

卷末黄跋后钤“菴翁更字复翁”白文方印,卷端等处又钤有“杨氏海源阁藏”白文长方印、“杨绍和印”白文方印、“东郡杨绍和鉴藏金石书画印”白文方印、“东郡杨绍和彦合珍藏”朱文方印、“献唐审定”朱文长方小印、“王献唐读书记”朱文方印、“献唐珍秘”朱文方印等诸印。装帧考究,书品宽大,包角金镶玉装,黄竹纸,浅绿色撒金笺纸书衣。

此书为清代著名藏书大家黄丕烈手校本。黄氏曾“遍借诸家藏本,手校于此”,包括明正统《道藏》本、明成化吴宽丛书堂钞本、元妙观《道藏》本、明范氏天一阁刻本、清顾千里抄校本等八种善本。一书在手,可以知道八个本子的情况。黄氏撰有跋文五篇,言其校书事。通篇菴翁朱墨校

跋,琳琅满目。经过黄氏批校后,增加了该书的学术性和文献价值,是一部“顾校黄跋”的代表作品。

黄丕烈藏书散出后,归汪士钟芸芸书舍收藏;汪氏书散出,又归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收藏。1930年海源阁藏书散出,时任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的王献唐先生在济南敬斋斋购得此书。1934年王献唐先生以“近人喜习此书,苦乏善本”的缘故,将其编入《海岳楼秘籍丛刊》中,影印出版。后来的某个时候,王献唐先生将这部《穆天子传》转让给了天津藏书家周叔弢先生。

1980年,顾廷龙先生为编辑《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之事,专程赴天津周府拜访。在周府,二人谈到海源阁藏书往事,谈到周先生捐献《永乐大典》及从山东藏书家王献唐先生处得到黄丕烈校跋本《穆天子传》一事。1980年,顾廷龙先生在为周先生撰写《自庄严堪勘书图跋》时也记录了两人的讨论《穆天子传》一事。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先生将自己珍藏的全部宋槧元刊、名抄佳刻举献国家。这部黄氏校跋本《穆天子传》,遂化私为公,入藏天津图书馆,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棠湖诗稿》一卷

(宋)岳珂撰,宋陈宅书籍铺刻本,一册,黄竹纸

岳珂字肃之,号亦斋,晚号倦翁。祖籍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著名抗金名将岳飞之孙,官至淮东总制置使。著有《金佗粹编》。

《棠湖诗稿》收官词百首,旨在追思北宋东京文物典章之繁盛及圣君贤相之懿范;面对当时南宋偏安的半壁江山,寄托丧国哀思,以此来规劝当朝统治者效法北宋的文治武功,以振兴国家。

卷后镌“临安府棚北大街/陈宅书籍铺印行”二行刊记。南宋临安业书者,以陈起、陈思父子为最著,以刻唐宋人诗文集为最多。

《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宋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不知其所自来”,疑“好事者嫁名于珂耶”。由于这部书自宋代刊行以来,公私书目悉不著录,四库馆臣未睹宋版原刻,遂得出了“好事者嫁名于珂”的错误结论。虽然余嘉锡先生曾为之作过颇具功力的

辨证,但是由于未曾目睹原刻,致使考订未尽周备。直至近年海内外学人仍或奉馆臣之说,或信疑参半,列为“伪书”“疑伪书”,均系受馆臣之言而致。卷末刊记可证此本为南宋临安陈氏刻本无疑。

卷端及卷末分钤“毛晋私印”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宋本”朱文椭圆印、“甲”朱文方印及“周暹”白文小方印等。书后有民国八年钱骏祥过录其从祖清钱仪吉跋并自跋、邓邦述跋、傅增湘跋。

宋刻《棠湖诗稿》,原藏毛氏汲古阁,著录于《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为“人间绝无”之物,七百年来一线单传,成为世间仅存孤帙。此书存世,既可纠正四库馆臣之误说,又增南宋临安陈宅书籍铺印行书之一代表作,弥足珍贵,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五代名画补遗》一卷

(宋)刘道醇纂,明末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一册,经折装

刘道醇,宋大梁(今河南开封)人,生卒年月及生平事迹均不详。著有《圣(宋)朝名画评》三卷。《五代名画补遗》是一部断代绘画史。其内容是对五代胡峴编纂的《广梁朝名画目》进行补遗。《广梁朝名画目》收录五代后梁时期画家四十三人,“记述虽备,阙坠尚多”,因此《五代名画补遗》将被遗漏的画家叙而编之,收录五代时期画家和雕塑家二十四人,分为七门:人物门、山水门、走兽门、花竹翎毛门、屋木门、塑作门、雕木门,每一门中按神、妙、能三品列传。

本书篇幅虽然不长,但却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如五代山水画家荆浩、关同,以及契丹画家李赞华等的记载,最早见于此书。同时,该书在塑作、雕木门中记载了杨惠之、刘九郎、王温及严氏的创作活动,是中国古代美术史籍中唯一为雕塑家专门列传的著作。五代是朝代更迭频繁的历史时期,《广梁朝名画目》已经失传,因此《五代名画补遗》的史料价值更显珍贵。

本书为明末藏书家毛晋汲古阁据宋刻本影抄,是四库底本。宋刻原本珍藏于辽宁省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据原刻本影印出版。今据《中华再造善本》中的影印本与影抄本比对,诚如馆臣所言,“纤毫无缺”,字迹、版式、行款、避讳、刻工,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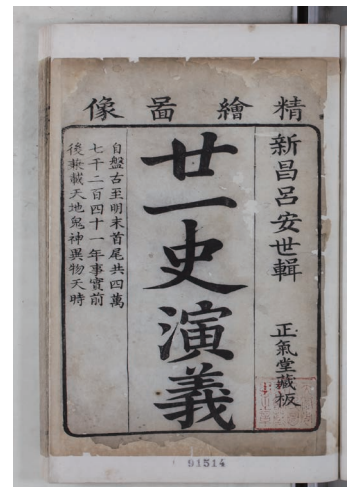
原刻。但是原刻本卷末后三叶有磨损,伤及文字,而影抄本则内容完整,可补原刻阙文64字。

本书钤印共38方,可谓朱墨灿然。有“毛晋私印”朱文方印、“子晋”朱文方印、“汲古主人”朱文方印、“宋本”朱文椭圆印、“甲”朱文方印、“汲古阁”朱文长方印、“开卷一乐”朱文方印、“毛扆之印”朱文方印等印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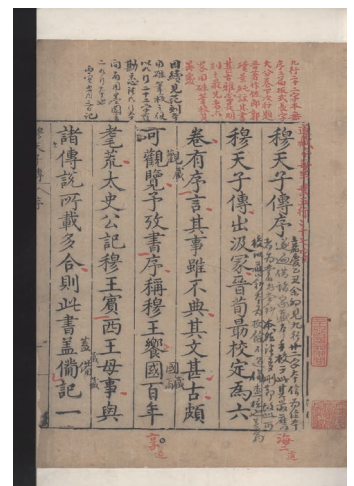
此书经静海励氏收藏,后由傅以礼(1826—1898)收藏,傅氏藏书曾在战乱中一度散佚,之后又重新搜集,所以其藏书多是在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收藏的。清代著名篆刻家赵之谦曾为傅以礼刻过一方“节子辛酉以后所得书”的印章,此印钤在该书的封面。傅以礼得到此书后重新装帧,为经折装,前后粘以金丝楠木护板,前板中间镌“五代名画补遗”,着蓝色;右下小字镌“汲古阁精钞本/华延年室珍藏”,着绿色;左下镌“大兴傅氏收藏印”“汉阳侯后裔”二方印,着红色。装帧华丽而考究,足见傅氏对此书的珍爱。傅以礼去世后,藏书亦随之散失。

本书虽为影写本,但是完整地保留了原刻风貌,在原刻文字损毁的情况下,更具有珍贵的资料价值,同时体现了汲古阁影钞本缮写精良、纤毫无缺的艺术特色。为天津图书馆独家收藏,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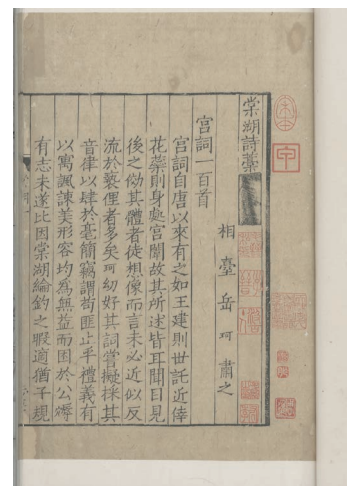
(天津图书馆张磊统筹供稿,白莉蓉、李国庆亦有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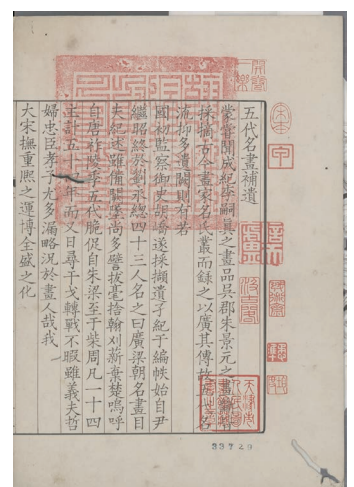
《精订纲鉴廿一史通俗衍义》



《穆天子传》



《棠湖诗稿》



《五代名画补遗》

沈阳市图书馆吴廷燮写本《明实录》 罕见珍本 极具价值

□宋晓莉(沈阳市图书馆)

作为拥有110年历史的沈阳市图书馆,现有古籍10万册,古籍善本书133部3038册。其中1部入选《国家级珍贵古籍名录》,53部入选《辽宁省珍贵古籍名录》。清末民初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为明代史料长编,是国内尚存的唯一一部较完整的钞本,为沈阳市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明实录》传写流布

《明实录》,一部明代官修的编年体历史朝史,书中所记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到明思宗朱由检结束,共计明朝16代皇帝的历史。

这种“实录”体,最早出现于南北朝时期,《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实录》《梁元帝实录》等。从唐代开始,每一位新君继位,都诏令史官根据前一皇帝的起居注、时政记、日录等,重新加以汇总,编成前一皇帝的编年大事记。此例一开,历代相沿,代代都有实录。但唐至元的实录都已亡佚,所存者只有唐韩愈撰的《顺宗实录》,共5卷,保存在《韩昌黎文集》中。实录是介于记注和撰述之间的著作,由于取材至繁,因此,新王朝都把前一朝代的实录,妥善保管,以备修史。

因明史多取材于实录,所以《明实录》在明代史坛上占据了“国史”的重要地位。明代《实录》规禁极严,吴晗在其《读史札记》中考校道:“实录纂修完成后,誊正副二本,其底稿则于择日进呈前,史官会同司礼监官于太液池旁椒园焚毁,以示禁密。”台湾版《明实录·序》中也记有:“廷臣非预纂修,不得寓目。”“新帝登极后,即召修实录”。其正本藏于石室金匱之皇史宬,副本则藏于内阁。足见,那时的实录是密不示人的,因而也就没有刻本。

到了万历以后,始有传写流布。因此,近代藏书家视钞本为珍本,而且其版本情况十分复杂,且多为残卷。传世重要版本主要有馆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本)、晒蓝本、台本、抱本(抱经楼本)、苏本、梁本、广方言本等。1962年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孟真、黄彰健等人以国内许多钞本及美国、日本微卷进行校勘明实录费时三十年,刊出了《校印明实录》一书。黄彰健在序中说:“史语所校勘明实录,所据本子不可说少,但仍然有些本子无法借校。据我所知,在国内,辽宁省立图书馆藏有吴廷燮送的太宗英宗穆宗实录……”序中提到的辽宁省立图书馆就是沈阳市图书馆于1929年至1931年间的曾用名。

吴廷燮其人

吴廷燮写本《明实录》(以下简称吴本《明实录》),是钞本《明实录》卷帙完整的一部,全书总计42函256册。记录了从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近三百年明朝的历史。

吴廷燮(1865-1947),字向之,又字次燮,晚年号景牧。祖籍江苏江宁,生于山西榆次,历史学家。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由誉录叙通判。光绪二十七年(1901)调署太原府同知。次年应山西巡抚赵尔巽之邀,出任太原府知府。光绪三十年(1904)随赵入京师政务处。次年补巡警部警政司郎中。后历任巡警部右参议兼宪政编查馆编辑、度支部参议、内閣法制院参议、署

副使兼弼德院参议。民国元年(1912)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民国三年(1914)任北京政府政事堂主计局局长,并被清史馆馆长赵尔巽聘为清史馆总纂。民国五年(1916)政事堂改国务院,主计局改统计局,吴廷燮任统计局局长。民国十七年(1928),北京政府解散,统计局随之结束,吴廷燮被阎锡山聘为顾问。后应张学良之邀,赴沈阳萃升书院,主讲史学。又受聘为奉天通志馆总纂。吴先生对明清两代的历史造诣颇深,是史表专家,辑录历代方镇年表十余种,也很重视地方志的研究,参加过《奉天通志》《江苏通志》《河南通志》等书的修纂。吴廷燮在中国史学领域颇有建树,尤其对明清两代的历史更是造诣很深。曾任中华民国总理的靳云鹏称道吴的学识:“京师士大夫,欲求朝章国故之学,言必向之吴君,……而国家考定大制度,倚君尤重,君职院局,余是以知君深。”

发现吴本《明实录》

1978年初,国家文物局在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工作,根据会议精神,成立了“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编辑领导小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善本书普查工作。沈阳市图书馆馆员在古籍清理和鉴别善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了吴本《明实录》。

当时从事古籍管理工作的沈阳市图书馆馆员杨书元,就他的发现,向曾经从事古籍管理的老馆员询问《明实录》的来源,回答说是从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前身)抄来。仅凭这一句话,尚不能成为写本《明实录》的终极定论。

当时,沈阳市图书馆因馆舍面积狭小,古籍图书分藏于沈阳故宫的文朔阁与沈阳歌舞团的小排练厅中的临时存藏点,两处距位于中街的馆舍都有一定的距离。为了查清《明实录》的来源,杨书元不辞辛苦,每天多次往返本馆与藏书处。功夫不负有心人,其后从馆藏古籍图书中发现了民国十九年出版的本馆馆藏一册,名为《辽宁省立图书馆馆藏第一卷》。在专著一栏中,有时任馆长卞鸿儒的一篇《馆藏写本明实录提要》,其开篇写道:“民国十八年岁末,江宁吴向之先生廷燮,旧藏写本《明实录》三十九函,二百四十四册(实为四十二函,二百五十六册)捐赠辽宁省立图书馆。”

为了获得更多的关于吴廷燮具体捐赠情况,杨书元又先后查阅了《中国丛书辑录》《清史稿》《奉天通志》《萃升丛刊》等书,收集了吴廷燮大部分著述,最后又查到了《国使馆刊》,在此看到了吴廷燮著的《景牧自定年谱》。在此,他写道:“民国十七年,张汉卿司令廷下充萃升书院主讲。”藉此证明,1928年吴廷燮不仅来到了东北,还对东北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这为1929年赠书之事奠定了基础。

藉上述两点,本可以证明其真伪,但杨书元又对全部写本进行了核对,在第2册里发现有吴廷燮撰序文一篇。此外

在铅印本《宣德别录》前,还有“江宁吴廷燮辑”的署名。

1980年,一位名叫杨文轩的读者到沈阳市图书馆查阅《萃升丛刊》,在与其交谈中得知,民国时,杨文轩曾就读于沈阳萃升书院,并且是吴廷燮的学生。这一次邂逅,使杨书元对吴本《明实录》又多了一个佐证。经杨文轩辨识,《明实录》中有几册是吴亲笔所录。吴的书法字体特殊,比较容易识别。这也是确认《明实录》钞本是吴廷燮秘藏珍本的佐证之一。

吴廷燮捐赠写本《明实录》

就吴廷燮捐赠一事,卞鸿儒在《馆藏写本明实录提要》一文的最后写道,“此书得归本馆,系君静庵之介绍,而王公维宙、翟公照人亦予以相当之赞助,最后张司令长官慨赠钞费以促其成。”

吴廷燮捐赠的初衷是:“吾老矣,向从前抄此书,颇费钩稽,子孙尚难世守,惧逐散佚,岂非虚掷精神乎!”而后又说:“吾以此书捐赠于辽宁图书馆,非惟书能永保,且为东来留一纪念计,无有善于此者”。

心怀感激的卞鸿儒馆长,特别于1930年1月15日在《大亚画报》刊登鸣谢启事一。为酬谢吴廷燮捐赠图书一事,卞馆长于当年的3月19日在沈阳著名的明湖春大饭店宴请吴廷燮,还特别邀请了当时的辽宁省教育厅厅长吴仲贤、省政府秘书长金毓黻、东北大学副校长汪兆藩作陪。对于吴廷燮捐赠写本《明实录》,东北人之所以十分看重,还是因为它的版本价值所在。

吴本《明实录》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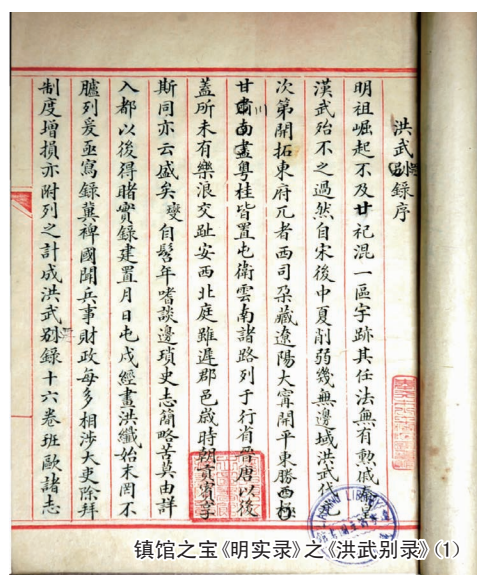
吴廷燮写本《明实录》,除《宣德别录》(于民国六年付梓,前有同年沁水贾耕序)系以铅印本补配外,皆系钞本,朱丝栏,行款、版式不一,多为十行,行十九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明代十六朝各有专录,皆抄自清内閣明清档案,并经吴廷燮本人严格校勘,是一部近于内閣原本的罕见珍本。因抄录时略有节删,所以个别改题“别录”。其中《英宗实录》七函四十八册,内有四函二十八册为棉纸楷钞,当为汲古阁本,弥足珍贵(注:汲古阁本是以二十八宿为次第,蓝格,每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吴本《明实录》是现存钞本《明实录》中卷帙较为完整的一部,它记录了有明一代各朝之史实故事,朝章国计,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是研究明史不可或缺的版本。

为了保护这部镇馆之宝,沈阳市图书馆从上至下,倾尽全力,设专库及副研究员级的专职人员进行研究与日常修护。

保护,是为了更好的承传。从2018年开始,沈阳市图书馆对这部吴本《明实录》全部进行了无接触式的扫描。目前,吴本《明实录》已扫描完成,正处于核校之中,不久的将来,这部沈阳市图书馆镇馆之宝,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



吴廷燮像



镇馆之宝《明实录》之《洪武别录》(1)



镇馆之宝《明实录》之《洪武别录》(2)

吴廷燮写本《明实录》收藏分册表

明代世系	吴廷燮写本《明实录》 题名及函册数	记事年代	备注
太祖洪武	《别录》 2函16册	壬辰年至吴元年 元年至三十一年	
惠帝建文		元年	附于 《洪武别录》
成祖永乐	《实录》 2函20册	元年至二十二年	
仁宗洪熙	《别录》 1函1册	元年	与建文 合为一函
宣宗宣德	《别录》 1函2册	元年至十年	印本
英宗正统	《实录》 7函48册	元年至十四年	
景宗景泰		元年至七年	附于正统
天顺		元年至八年	
宪宗成化	《别录》 1函8册	元年至二十三年	
孝宗弘治	《别录》 2函14册	元年至十八年	
武宗正德	《别录》 2函12册	元年至十六年	
世宗嘉靖	《别录》 6函45册	元年至四十五年	
穆宗隆庆	《实录》 2函12册	元年至六年	
神宗万历	《别录》 10函50册	元年至四十八年	
光宗泰昌		元年	附于 万历年
熹宗天启	《别录》 1函3册	元年至七年	
思宗崇祯	《国榷》 2函12册	元年至十七年	

古籍与特藏文献的装具及保护方法

□赵晶(太原市图书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以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今几千年前。在这浩渺的长河中,“典籍”就像一艘载满宝藏的“宝船”,将中华文明世代传承。在太原市图书馆(以下简称“太原市馆”)古籍部工作的我,工作之间,得幸能“与典为伴,与籍为友”。

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宝贵的典籍,太原市馆先后制作了多种保护装具。这些装具,不仅能起到防尘避光的作用,还能更有效地驱虫、抗侵蚀,使得这些宝贵文献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泽被后世。

这些保护装具按内、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外装具(主要是书柜),另一类是内装具(在这里主要提及为与文献紧密贴合而采取的外在保护措施,比如:盒、夹板、书套、袋、囊等等)。

太原市馆通过采用不同举措与分工的保护装具,在典籍的保护方面,探索了一条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保养”双管齐下的典藏管理办法。下面我将结合日常操作来谈。

外装具保护及其优势

图书馆广泛采用的外装具就是书柜,太原市馆也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在外装具的选择与配置上下了许多功夫,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大地改善了文献的保护环境。

现在,市面上的书柜分为木

制和金属两种。这两类书柜各有特点。以金属材质的书柜来说,其密集架很容易生锈,这样就有机会黏住古籍底部,从而增大了典籍被腐蚀的可能性。其次,当外在环境的温度与湿度相对较高时,由于金属材质不具备透气性,很不利于保护长期密闭在此的文献。再来看木制书柜,由于在选材上十分讲究,所以备受青睐。好一点的书柜通常都是选取一些结实耐用、没有虫蛀、湿度适合、不容易开裂又没有虫眼的木材制作而成,这种类型的书柜从源头上来说,其材质本身对古籍而言就是一种很好的保护。

在设计方面,木质书柜有两个保护优势。其一,为了防备书库漏水,在制作上还需配置一个木制托架,底板距离地面的高度控制在20厘米左右,安装时要将书柜放在托架上,这也是优于金属书柜的地方。其二,除此优点之外,大部分木制书柜是用混合材料制作而成,框架结构大多选用榆木制作,书柜的背板和内部隔板上则通常选用香樟木,这种材料混搭凸显了其优势。樟木质地坚韧,不容易变形,纹理漂亮,而且身怀异香。这种香气可以很好地起到防霉、杀菌、防虫、防蛀的作用。我馆在2017年新馆建成之时,将古籍书库内全部更换为质地考究的樟木书柜,使古籍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外装具书柜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了空间,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书库内有限的面积。在书柜内

部分层分隔放置古籍,便于存取,又使得书柜内部的樟木隔板充分发挥作用。其次,密闭的书柜还能更好地防光、防尘、防水、防湿气。当书库内湿度发生变化,木制的书柜可以起到释放和吸收湿气的的作用,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隐形的天然屏障。太原地处北方,四季分明,干湿变化对比明显,采用樟木书柜更有利于太原市馆的古籍典藏保护。

内装具保护及其优势

太原市馆在典藏方面除了采用外装具保护之外,也非常注重内装具的保护与利用。很显然,内装具是相对于外装具而言的,它就是与古籍直接接触的保护措施,且具有体积小、轻便、防挤压等特点。这类内装具作为第二梯队更好地保护了古籍文献。

据考证,在我国古代,内装具做工精良,用料讲究,大都选用上等的绫罗绸缎。它与古籍一起随着岁月沉积下来,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都是我们现代人研究学习的宝贵资料与财富,应该与古籍一同保护起来。下面具体介绍一下内装具:

1. 种夹

内装具主要有盒、夹板、套、袋、囊等几种。书盒大多选用木制。在开盖的方式上花样很多,有前开、侧开、上开等等。这种装具显得稍重,但在形式上也显得庄重,受到了藏书者的重视。函

套常见的有:四合套、六合套、云套、插套等,其中插套存在一定的弊端,当南方盛夏时节湿度增高时,插套在透气性上不如四合套及六合套,易变形、生霉菌。夹板常见有平板式、穿带式等。书库中以函套为常见。

2. 函套的制作及要求

函套的制作需要按照不同的古籍,逐个“量体裁衣”,不适合批量生产,这样才能合适得体,松紧恰到好处。在选材上,纸板是制作函套的基本材料。对纸板的要求为中性或弱碱性,厚度在2-3毫米,工具有:剪刀、锥子、尺子、马蹄刀、骨别子、蓝布或绫子。尺寸量好后,将纸板裁切好,并将四边划成45度的斜角,以便在与另一纸板连接对折后形成一个90度的直角。挂布,将选取的面料背面用鬃刷均匀地刷上浆糊,把纸板按顺序摆放在上面,进行黏接。制作好后,放置于阴凉处压平,自然晾干。函套的制作既要认真计算出每函书的长、宽、高,精确到毫米,又要手稳、刀稳地准确裁切出每一块纸板。它的制作是集体力、脑力、眼力于一体的细致工作。

在要求上,所有材料都选取中性或弱碱性。浆糊是这一手工制品的主要材料,应选小麦、淀粉来进行冲调,掌握好浆糊的稠稀,这一步直接影响上浆的效果及函套的美观性。常用织物有:蓝棉布、宋锦等,通常选用软缎类织物来进行制作。不可以使用化纤类,应保持颜色稳定,防止掉色污染古籍。

3. 纸袋

宣纸有耐久耐老化、韧而能润、搓折无损、不容易变色等优点,是制作纸袋的理想材料。可以将宣纸托裱后,按照古籍特藏文献尺寸折叠成纸袋进行收纳保存。

在选择具体使用哪种装具时,书库环境是首要考虑的因素。比如在南方城市,书库内不容易达到恒温恒湿的控制,那么函套类的装具不太适合,容易产生霉菌。相反在北方城市,书库内温度和湿度不稳定的情况下,夹板则会加速风干老化。其次,古籍装帧形式也是要考虑的因素,线装成册的文献可以选择函套、夹板,卷轴装选择书盒,遇到单张文献先采用纸袋保存,汇集成一摞后可以选用函套等装具。

太原市馆的古籍装具配制工作多年来一直在进行。2017年改扩建后,新馆书库恒温恒湿,避光良好,既可以防尘,又有适度的空气流通。目前使用的古籍外装具全部为樟木书柜,内装具主要有函套、书盒、夹板等。馆藏善本、普通古籍、民国文献全部存放于樟木书柜内,书架每块层板上镶嵌樟木衬板,充分利用了宝贵的恒温恒湿书库,起到了多重保护的作用。

这就是我多年来在太原市馆古籍保护工作中积累的一些经验。古籍装具是古籍保护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希望我的一点心得和体会,能给大家带来一定助益。

中国传统手工纸:纸寿千年,余韵悠悠

□张雪梅(太原市图书馆)

“麻构竹藤桑,青檀稻瑞香”“沔煮晒漂春,捞漉抄榨墙”……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至今,传统手工纸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不仅传承着人类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而且还保留了古老的文明气息和心手造物的艺术方式。它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凝聚着无数先民的聪明才智。

关于手工纸,《说文解字》中有记载:“纸,絮一苦也”。絮,指漂在水中的植物纤维。苦,即帘模。从造纸原料中提取植物纤维,混于水制成浆液,用帘模抄起待滤除水分,再将留在帘模上均匀的纤维薄层揭下来,经干燥后,即成为纸。

中国的传统手工纸按原料来源可以分为麻纸、皮纸、竹纸、草纸和混料纸五大类。麻纸是以大麻、亚麻、苎麻等麻类植物纤维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纸。麻算是最悠久的造纸原料,唐代以前大部分纸是麻纸,目前麻纸的制作主要集中在山西。皮纸的原料主要是桑树、檀树、构树等树的树皮,提取树皮中的韧皮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纸;皮纸之中最常见的是构皮纸,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蔡伦时期,后世闻名的澄心堂纸即为构皮纸,构皮纸也常称为棉纸;竹纸是以毛竹、苦竹、慈竹等竹类的茎干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纸,原料采集以嫩竹为主。我国晋代就出现了竹纸,唐宋广泛使用。常见的竹纸有毛边纸、毛太纸、元书纸、连史纸等;草纸是以稻草等草类纤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纸;混料纸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原料混合在一起制成的纸。有“纸寿千年”之称的宣纸就是用青檀皮和稻草混合而成,是混料

纸的杰出代表。混料纸可以综合各类纤维在造纸上的优点,所以发展迅速并使用广泛,现在的纸大部分是混料纸,很少有单一成分的纸。

经过造纸过程生产出来的原纸(又称“生纸”),尤其早期以麻、皮等粗纤维制成的纸多表面粗糙,薄厚不一,并不适合于书写,而且随着古人对纸张审美的不断提高,加工纸应运而生。经过捶研、施胶、涂蜡等工序,可以使纸张紧致平滑,抗水不洇,适于书画。古代文人雅士将纸作为艺术品,染色饰画,洒金印花,一纸彩笺,美不胜收。后世各种五色纸、十色纸、薛涛笺、谢公笺、磁青纸、粉蜡笺等都是经过染色,配以漂亮的花纹,如虎皮槟榔、水纹流沙之类,还有洒金、云母等点缀装饰而成。加工过的纸不仅改善了生

纸较为单调的表面特性和纸张质感,还大大丰富了手工纸的色调和品种,拓展了手工纸的功能和应用领域。

魏晋黄纸,又称“潢纸”,用黄檗浸染而成,可以防虫蛀。唐代在此基础上涂蜡,发明了硬黄纸,此纸可以长期保存,而且光泽莹滑,善书者多用以临帖写字。苏轼作诗赞道:“新诗说尽万物情,硬黄小字临黄庭”。

明代磁青纸,用靛蓝染成,因色泽与宣德青花瓷相似,又称“瓷青纸”。磁青纸的颜色深蓝,静谧庄重,常用来抄写经书。

唐艺粉蜡笺,兼具粉、蜡之优点。乾隆年间大量制作粉蜡笺,以五色纸为原料,施以粉彩,再手工捶轧而成“五色粉蜡”。有的在纸面上用胶粉施以细金银粉或金银箔,使之在粉蜡笺上呈现出金银的光彩,称为

“洒金银五色粉蜡”;有的则用泥金描绘山水、云龙、花鸟、折枝花等图案,称“描金五色粉蜡”。

薛涛笺,是唐代女诗人薛涛设计的一种笺纸,相传是由“浣花溪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作而成,有十种颜色,其中以深红色最有名,又名“深红小笺”。这种红色小笺曾被薛涛用以写诗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人相唱和,因而名著于文坛。薛涛笺因颜色、花纹精巧艳丽,被无数文人视为珍品,流传至今。

几千年的造纸历史,流动着匠人的精巧技艺,凝聚着文人的厚重情怀,也彰显着中华民族的品位与格调。时至今日,那精雕细琢的手工纸张依然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沿袭古法,传承文脉,纸寿千年,余韵悠悠。



《十六国春秋辑补》(全三册)
作者: (北魏)崔鸿撰, (清)汤球辑补, 聂澂萌、罗新、华喆点校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 2020年3月
定价: 158.00元

《十六国春秋》的成书、散佚与辑佚再现 《十六国春秋辑补》整理出版

时,《十六国春秋》基本完成。崔鸿生前,这部书稿知者甚少,直到永安年间(528~529),崔鸿长子崔混担任秘书郎,才将《十六国春秋》献上秘阁。

把十六国诸史整合为一部通贯的史书,主要包括三方面工作。一是诸国各立年号,各方记事都以本国纪年为准,需要比定纳入同一纪年体系中。二是诸史或为纪传体,或为编年体,需要尽量统一。三是有些史事彼此互见,或见彼不见此,需要整体考虑,把某国之事尽量集中于该国录内,原本记载有不同之处也应适当处理。为此,崔鸿制作了《序例》《年表》各一卷,帮助他在各个方面统合诸史。

秋》刊本。其一是万历三十七年屠乔孙、项琳之刊行的一百卷本,径题为“崔鸿撰”,但实际上它的取材并不限于崔鸿之书,而是把各种有关十六国的资料汇为一编,不标注出处,大体可视为一部明人重撰的十六国编年史。其二是稍早的何鏗《汉魏丛书》中的十六卷本。其内容与《太平御览·偏霸部》所引崔鸿书各录基本一致,部分国家多出的内容亦基本见于《晋书·载记》,恐怕也是很晚出的本子。清代修《四库全书》时,将以上两种版本的《十六国春秋》同时收录,并将何本改名为《别本十六国春秋》。在汤球重辑以前,清人见到的主要就是这两种《十六国春秋》。

事皆保留年月,而具体事件则删略为寥寥数言。与此相反,《晋书·载记》则保留了较多对历史事件的具体记载,而删去了绝大多数事件的时间。把《纂录》与《载记》两种文本合而为一,再连缀群书中的《十六国春秋》佚文,可以形成一份编年相对明确、记事相对具体的文本,应该说是综合考虑了科学性与读者便利的优选辑佚方案。

尽管汤球在《十六国春秋辑补》上倾注了大量心力,但也难免有不足之处。就今人利用此书而言,有两方面问题特别值得警惕:一是在缀连文字时过于机械,可能反失其真;二是编年详尽,但可能迷失在十六国史事纪年无法避免的混乱中。对于前者,我们尽可能在校勘中指出,也希望读者在利用《辑补》时,重视分辨其史源,查对原始出处。对于后者,则要注意汤球《辑补》的系年是后人《御览·偏霸部》、《通鉴》、正史帝纪等几种不同系年记录体系进行选择 and 整合的结果,不可不加考辨而直接采信。

一、崔鸿事迹与《十六国春秋》的成书

《十六国春秋》是北魏崔鸿以十六国诸国史为基础撰写的一部史书,记载了西晋衰乱以来至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的一百四十年间,中国北方(及蜀地)政权分立的历史。在这段时期里建立的政权并非只有十六个,但崔鸿认为“自晋永宁以后,虽所在称兵,竟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后人把这个时期称为“十六国”,正是由于崔鸿此书的缘故。

崔鸿(478~525),字彦鸾,清河人,北魏史学家,是北魏名臣崔光之侄,《魏书》有传。崔鸿历任孝文、宣武、孝明三朝,预议律令,修《高祖世宗起居注》,又受诏修辑国史。他从宣武帝景明年间开始通过公私渠道搜集诸国旧史,经过几年的搜罗抄写,除成汉史书以外的诸史终于齐备,遂自正始元年(504)至三年(506)末,草成九十五卷《十六国春秋》,尚阙蜀汉一录五卷。正光三年(522),崔鸿终于访得成汉之书,重启十六国史撰作。到孝昌元年(525)崔鸿病卒

二、《十六国春秋》的流传、亡佚与重见

《十六国春秋》进上秘阁后,成为北朝隋唐官方修撰中最重视的十六国史书。北齐时祖珽带领诸学士在梁人《华林遍略》的基础上改撰《修文殿御览》,主要增补的史书就是《十六国春秋》与“魏史”。唐代史官重修《晋书》,设立载记,是取《十六国春秋》删减以成。

《隋书》、两《唐书》艺文经籍志都著录了《十六国春秋》,而大多数宋代目录则没有记载。由于《资治通鉴考异》多次提到《十六国春秋》,《通鉴》所记十六国史事也有不少并不见于《晋书·载记》,早期学者多相信崔书亡佚于北宋末。余嘉锡指出,此书尚见于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近来学者也搜集了一些明代《十六国春秋》存世的证据,但都是书目著录,未详其书内容,不知是否崔鸿原书。无论如何,从南宋到明代中前期,此书的确声迹罕闻了,《永乐大典》也没有引用,应该说崔鸿原书即便在明代尚存世间,亦不为学者所见,可以说是亡佚了。

明代中后期,出现了两种《十六国春

三、汤球与《十六国春秋辑补》

汤球(1804~1881),字伯珪,安徽黟县人,清代学者,《清史稿·文苑传》有传。汤球一生最大的成就当属对两晋十六国时期历史文献的辑佚,而以围绕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工作用力最深。

《十六国春秋辑补》一百卷,依《魏书·崔鸿传》提到的诸国次序,设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南燕、夏、前凉、蜀、后凉、西秦、南凉、西凉、北凉、北燕十六国录,另制《年表》一卷。

在正式辑补《十六国春秋》以前,汤球先整理了十六卷本《十六国春秋》,取《太平御览·偏霸部》对校,依《隋志》著录卷数改定为十卷,题为《十六国春秋纂录校本》(简称《纂录》)。

汤球《辑补》是以《纂录》和《晋书·载记》(及《张轨传》《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为主干,再穿插其他散见佚文的。《纂录》和《载记》之间,则依然以《纂录》为主。《纂录》节引的《十六国春秋》重视编年的属性,每

四、本次整理工作的说明

本次整理《十六国春秋辑补》,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广雅书局刊本为底本,以校核史源为工作重心,参考《十六国春秋纂录》《晋书·载记》以及《太平御览·偏霸部》等诸书中的《十六国春秋》佚文,逐条复核,逐层考辨,厘清史源,指出错漏。来自诸书的《十六国春秋》佚文,汤球已标注出处者,对于汤球小注指涉文句起点不明或因裁剪拼缀丧失重要信息者,酌情加以说明;对于汤球漏注出处以及无明确出处的内容,也出校说明。希望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且便于阅读利用的《十六国春秋辑补》整理本。

(本文摘编自《十六国春秋辑补》前言)

古籍漫谈



《论语讲析》
作者: 周志文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10月
定价: 88.00元

□ 杨惠雯

“五四时代百科全书式学者”毛子水先生曾引用威尔斯的话“《论语》可列为世界十大书之一”来评价《论语》,而他更认为《论语》是中国的第一书。他认为,《论语》讲的是一种道,这种道是天下之道、太平之道,更是仁爱之道。所谓“天下有道”更趋于从古至今的一种对和平的期盼,一种乐国乐民的民声。

虽言论语,却论仁道 《论语讲析》漫谈

周志文先生《论语讲析》中的见解与毛子水先生所言亦有同工之妙,他认为孔子不仅是“仁政的传播者”,更是历史的“集大成者”。其言有据,孔门之观不仅表现在“尚文”,亦表现在“尚用”,不仅有“诗”的兴观群怨说所起到的文的作用;更有“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实用主张,而此主张相较于文之说而言,则更具有目的性。因此,文所辅助的还是德。德所应用的亦无外乎政。而无论是“尚文”抑或是“尚用”,都应用于历史的施政中,确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至此,周先生的文学观与历来之研究并无不同,然其跳出孔门研究,而从《论语》中观儒家,却有一种现代研究的宏观考量。

因此,《论语讲析》与其说是在解析《论语》,不如说是跳出儒家的精神进行解析。郭绍虞称孔子为邹鲁鲁绅先生之道诗书礼乐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孔门之文开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周先生则从“文”入手,研究于微末,探索于宏端。

事形于言,言形于文,文形于字。文字的发展影响着“文”的进步。象形文字作为最古老的文字,具有表意的作用。在

《论语讲析》中,应用象形文字来解释,则让流传至今的《论语》有了一种自原始时代而来的渊源。比如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在大部分的解析文本中,“子”作身份尊贵、值得尊重的人的通称,寥寥数笔,一带而过。此书却先历数“子”这个字的源流,自象形文字起至春秋之后的演变,进而表明“子”是老师、先生的代词。

由字解释文,再通过语言来表述,有一种思想的轴线性,也具有一丝文学研究中的横向研究意味。自原始社会起,结绳以计数,久而久之便有了“文”(泛指),再经由歌、谣传颂,经编纂、整理而具有了具象性的意义。因此,语言在儒家理论的传承中亦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不仅是克己复礼的一种无形约束,更是孔子育人、说教的媒介,推广“仁”的手段。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句话中的重点在“思无邪”。孔子用一句话来概括《诗经》305篇,统称其为“思无邪”。《诗经》是语言表达的心声(合集),虽后世将其作为后宫立德之典范,然而其最初却是不同阶层的“声音”,是自我情感的抒发,是向天祈福的愿景。因此,《诗经》中

语言所表现出的“思无邪”便具有了两面性,如周志文先生所说,“孔子判定所有文学家、诗人的艺术创作都是无邪的,而欣赏者也要以无邪之心,才能进入文学与诗的真实世界。”在此处,即便是抒发情感的“言”,也具有了儒家“仁”的意味,隐性的发挥了道德的作用。

当然,《论语讲析》不仅从字开始引入,从文与言进行研究,更通过事来进行观点的论述。《论语》中的孔子是怎样一个人,他的言论为什么会后世产生影响,本书对各家的研究理论有哪些见解,周志文先生都通过详细的资料予以展开、论述,进而表明《论语》并非是纯粹的儒家,也并非“儒道合一”,二者可平行亦可交叉,只要是“仁”的事例,均为孔子所接受。

由是,《论语讲析》便具有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层次,通过东西方文论的阐述来表明孔门之观中的“仁”,亦表明本书解析中的理论依据。“字、文、言、事”的资料佐证,丰富了《论语》的解读,也让读者避免解读时的囫圇吞枣与步入误区。周志文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历史真相的指向标。



引导大众:走近儒家经典,学习传统文化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出版缘起

《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经典》
编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定价:56.00元

本书依讲座十讲分为十篇: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复兴、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儒学中的“普遍价值”、儒学的基本精神、儒学的发展历程、孔子与当代中国、儒家经典的编纂、儒家经典的现代意义、儒家经典的现代诠释、儒家乐感文化的现实应用。全书紧扣一点,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幸福息息相关。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儒学的历史发展及其核心价值、儒家经典的现代转化及现实意义三个方面,阐述了“民强则国强,国强则民乐”的核心观点。

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在那段时间里,人类的精神世界有了质的飞跃,人类的几大文明模块大致在同时期确立起来,其标志就是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有释迦牟尼,两河流域有犹太教的先知们,中国有孔子。这一时期正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先秦诸子百家之学是中国学术思想中最有原创性质的部分,是中国学术思想中最纯正的代表。

百家之中,首推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其思想对后世中国和东亚文化圈影响最为深远广大。元代阎复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仪范百王,师表万世者也。”

国家图书馆始终致力于儒家经典的收藏和保护。有许多儒家经典的珍稀版本,如南宋初刻本《周易正义》、宋刻本《毛诗故训传》、元岳氏荆溪家塾刻本《论语集解》、宋庆元六年(1200)绍兴府刻宋元递修本《春秋左传正义》等。这些珍稀儒家典籍都精心收藏于善本库中。近年来,国家图书馆又特别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阐释、宣传和推广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支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编纂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选的就是《论语》等儒家典籍。

2016年,国家图书馆与孔子故里曲阜市文物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并于次年

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圣贤的足迹,智者的启迪——孔府珍藏文献展”,这是孔府高等级文物第一次离开曲阜,进行大规模、系统性集中外展。展览期间,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密切合作,联袂主办了“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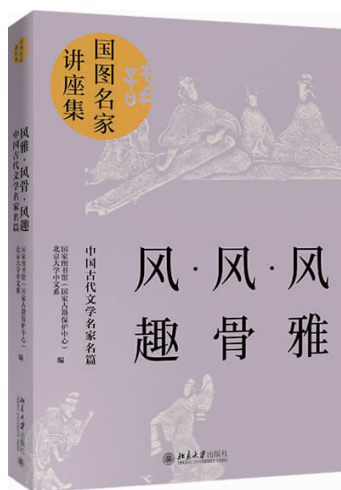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有深厚的儒学研究传统。自近代以来,在蔡元培、熊十力等大家的坚守和努力下,北京大学成为儒学研究和思想发展的重镇。以汤一介先生为首倡导和承担的《儒藏》工程,汇集儒家经典及历代注解、儒学著述,为后人研究儒家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材料基础。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考察北京大学,曾专门了解《儒藏》编纂情况,与汤先生促膝交谈,并赞扬他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创新作出了很大贡献。系列讲座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中华教授邀请专家,设计课程。讲座所邀楼宇烈、孙钦善、牟钟鉴、李中华、安平秋、陈来、王博、魏常海、景海峰、郭齐勇诸先生,均为驰名海内、学有专长的通儒大家。

从2017年11月29日起,系列讲座持续进行了三个多月。十位著名学者先后登上国图讲坛,从各自研究视角详尽讲解儒家学说的发端、发展及当代价值,引导大众在观展的同时走近儒家经典,学习传统文化。讲座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每每

一席难求。为回馈大家的厚爱,并使名家灼见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推广,讲座结束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稿整理出版,是为本书。

2019年3月24日,习总书记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向习近平主席赠送了1688年首部《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习总书记说:“这个礼物很珍贵,我要把它带回去,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论语》是表现孔子人格的益智良书,字字精金美玉,是人类千古不磨之宝典,是儒家文化经典中的经典。习总书记接受国礼法文版《论语导读》,并拟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孔子思想作为全人类文明共同财富的有力见证,也是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标志。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乘此东风,将“孔子·儒学·儒藏——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名家系列讲座”讲稿付梓,是让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举措,同时也是“十三五”期间古籍保护系列宣传推广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为讲座稿集成书,故保留了一些口语化叙述。讲座的举办与讲稿的出版,除编委会成员的共同努力外,还有赖于国家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韩永进先生、孔子博物馆馆长孔德平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致谢忱。



领略古来才人风貌,管窥古代文学研究理路 《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篇》出版缘起

《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篇》
编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中文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定价:75.00元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总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欣赏(诗、词、小说等)、《诗经》中的“变雅”、《左传》如何读、诸子三著:《论语》《庄子》《韩非子》、陶渊明的诗歌艺术、安史之乱中的李白和杜甫、元白的盛唐记忆之异同、“指出向上一路”的东坡词、唐宋古文运动的三重维度、元杂剧公案剧中的奇思巧构、绵延千年的想象力:文言志怪传奇小说的奇幻世界、《西游记》的文本结构及其寓意、作为小说标准的《红楼梦》。

古代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遗产极为丰富,既有言简意赅、表现力强的突出特点,又有诗以言志、文以载道的现实功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章、讲话与著作中频繁引用古代文学中的名言名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诗赋小说尽入文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将“故纸堆”里的典故赋予“新生命”,是总书记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高度重视的体现。由此可见,古代文学研究的普及工作,其意义不仅是传播文化知识,更是传递一种理念,一种理想,甚至还可以说,是在从事一项民族文化集体认同的凝聚工作。关于古代文学的研究,绝不应该束之高阁,而是要发挥其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重要职责,承担起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以文培元的重要使命。

北京大学中文系传统悠久、名家云集,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实力雄厚、蜚声内外,是众多青年学子和文学爱好者向往的崇高殿堂。国家图书馆藏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中文古籍,其中大量集部善本流传有序、既罕且珍,是为百代先贤灵秀之所独钟。2019年春,国家图书馆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合作举办“风雅·风骨·风趣——中国古代文学名家名篇系列讲座”,邀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十二位具有丰富授课经验的著名学者

登上国图讲坛,将文学史研究与名家名作精讲相结合,纵横千载,臧否百家,从惊鸿一瞥间,领略古来才人风貌,管窥古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路。

讲座首场以对话沙龙的形式,邀请葛晓音、张鸣、刘勇强三位教授,同论共论中国古代诗、词、小说三种文体的赏析之法。随后,于迎春、傅刚、常森、钱志熙、杜晓勤、李简、李鹏飞、潘建国等学者先后主讲,葛晓音、张鸣、刘勇强三位先生复次登台。系列讲座大体以先秦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时段为序。或从名著着眼,讲解先秦古诗如《诗经》,史传文学如《左传》,诸子散文如《论语》《庄子》《韩非子》,明清小说中的杰出代表如《红楼梦》《西游记》;或从名家切入,介绍陶渊明、李杜(李白、杜甫)、元白(元稹、白居易)、苏轼等人的人生经历与作品精神;或立足文学史研究,考察唐宋古文运动的深层内涵;或以同题材佳作类比对读,畅谈元杂剧的奇思巧构、文言小说的奇幻世界。

先是,2018年秋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历史学系十一位知名学者以国家图书馆为平台,通过十五场中国古代断代史讲座,带领广大历史爱好者们走近历史现场,探寻史学研究之门径,让普通民众像北大学生一样亲炙众多名师。这样的安排,使得讲座的轰动程度远远超出主办方

预期——偌大讲堂,几乎每场讲座都有一半听众席地而坐,不知疲倦地尽享第一流学术资源。此后,应广大听众强烈要求,这一形式由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中国古代史班底并称伯仲、抗手学林的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团队复制,亦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响应。特别是首场对话活动,男女老少观者如堵,讲堂内外几无立踵之地,颇有向学之人躬逢其盛、虽锦堂高骊不与易的景况。

当前,随着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传播途径的不断革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社会认知度、参与度空前高涨,民众对于优质学习资源的需求极为迫切。系列讲座的火热开展,即其明证。由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提供平台,邀请专门之家向大众系统、完整地讲授专门之学,并与互联网传播相结合,实现专业知识的普惠效应,这一做法必将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特别是古籍活化的重要范式。

为回馈观众的厚爱,并使名家灼见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讲座结束后,主办方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稿出版,是为本书。此外,本系列讲座讲稿的整理校订等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官瑞龙、武姝言,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郑小悠、冯坤具体承担。在此谨缀数语,聊致谢忱。